

編後語

90年代以來，大陸經濟發展與香港政治爭論，再度成為舉世注目的焦點。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和「經濟與社會」兩欄六篇文章，就都圍繞着這兩個關乎中國未來的敏感問題立論。王紹光、胡鞍鋼分析中國政府汲取能力下降及其後果；關信基評述並前瞻香港政爭和未來發展；楊大利、崔之元、饒餘慶、蕭耿等學者不同意王、胡二位的論述；何清漣所着眼的則是中國當前推行股份制的問題。這數位政治學、經濟學學者，都是在學術規範中討論現實問題，各抒己見，觀點鮮明，形成論辯，實為難得。這裏，我們願意借用關信基一文最後一段中的幾句話與讀者共勉：任何制度規範的建立都是一個「開放性的，需要不斷對話的學習過程」；對既成的制度法規，學者應有「一種批評性的忠誠，有了批評性的忠誠，才可以使我們在不完善的生命現實中願意投資參與改善制度的努力，制度的發展因此也有長遠成功的保證。」

本期有幾篇文章涉及對中國現代性和傳統價值觀問題的思考。如高力克從梁漱溟談鄉土中國與中國現代性，李澤厚再談他提出的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高瑞泉的書評則圍繞「誰應對近代中國的價值迷失負責」；而劉小楓在「批評與回應」一欄中撰文，討論著名社會學家金耀基的「現代化」論及其問題意識。如劉小楓所言，處於世紀末的學術界，應主動承擔總結二十世紀學術經歷的課題；他認為，百年來無論中外知識界所關注的實質問題都是現代現象；而中國學者應該以社會科學實證知識為工具來建構中國的現代性研究。

我們還要特別向讀者推薦，日本著名中國思想史學者溝口雄三應本刊編者之邀而寫的〈中國與日本「公私」觀念之比較〉一文。如文章標題所示，這是一個重要而令人感興趣的題目。更難得的是，作者沒有停留在「公私」觀念層次，而是進一步論述這種觀念差異如何影響中日社會和國家組織的不同，並圍繞學術界關注的私人領域、民間社會等問題，闡述自己的見解。此外，本期續有劉軍寧、木令耆對前兩期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發表評論及感想。

新年伊始，本刊在版面和人事上也有變動。應楊振寧編委的建議，「科技文化」欄做了較大的改進，請讀者留意該欄按語。同時，本刊編輯室最年輕也最文靜的兩位同事——范頌基先生和鄭靜霞小姐，都在最近轉到更富挑戰性的工作去了。我們在此謹祝他們今後各有遠大前程。